

# 蔣介石與 1950 年代初期的“反攻大陸”

劉大禹

[提要] 蔣介石敗退至台灣後，試圖“反攻大陸”，但受到美國外交政策及自身力量不足等多重限制。為此，蔣介石著力突破“杜魯門聲明”，利用潛伏與游擊戰，加強對大陸的滲透。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卻限制蔣“反攻”。蔣伺機派兵援韓作戰，制定“反攻”計劃。艾森豪威爾任美國總統後，解除“台灣中立化”，蔣“反攻大陸”更為積極，採取了一定軍事行動但均遭失敗，被迫推遲“反攻”時間。蔣介石通過“反攻大陸”，爭取了美援，穩固了國民黨在台灣政權，此後蔣介石以國共內戰延續為藉口，強化在台灣威權政治。

[關鍵詞] 蔣介石 朝鮮戰爭 反攻大陸

[中圖分類號] K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3-0194-09

1949 年蔣介石敗退至台灣後，試圖利用朝鮮戰爭的機會“反攻大陸”。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朝鮮戰爭本身出發，探討美國的全球戰略，其重點在歐洲，反對台灣用武力“反攻大陸”，以引起在亞洲的熱戰擴大化；<sup>①</sup>二是探討 1960 年代美國的對台政策與國民黨“反攻大陸”；<sup>②</sup>三是有關海峽兩岸具體的小規模戰鬥，如古寧頭戰役、浙東島嶼的爭奪、金馬的防衛戰等，此類研究成果以台灣為多。<sup>③</sup>對於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有論者指出，蔣 1950 年復職後，首要目標就是“光復大陸”，但他從來沒有真正的機會實施反攻，故對其相關思考及行動未予闡釋。<sup>④</sup>

蔣介石退台初期“反攻大陸”並非單一事件，乃是理解冷戰期間國民黨、共產黨、美國、蘇聯四方關係的平台，也有助於深入理解兩岸關係的發展軌跡與深化蔣介石的相關研究。基於此，筆者試圖綜合利用台北“國史館”所藏檔案、《中央日報》、“蔣介石日記”以及《紐約時報》等多方資料，探討蔣介石敗退台灣初期，利用朝鮮戰爭的國際大勢，制定“反攻大陸”的計劃與具體實踐，以展現冷戰背景下的遠東場景。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稱的 1950 年代初期主要是指 1950 年到 1953 年的朝鮮戰爭期間，並延伸至 1954 年 12 月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為止。

## 一、突破杜魯門聲明，對大陸實行滲透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如秋風掃落葉般消滅國民黨在大陸西南地區的殘餘力量，徹底統一全國指日可待；蔣介石及國民黨敗退到台灣，惶惶不可終日。因國共內戰歷程的慘烈以及意識形態的分歧，在美蘇冷戰背景之下，兩黨彼此的“不共戴天”，達到了前所

未有的程度，雙方均試圖徹底消滅對方。中共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蘇聯幫助下加緊訓練海、空軍，以儘快實施“解放台灣”戰略，1950年1月決定由第三野戰軍完成此一任務。蔣介石並不承認國民黨完全失敗，既欲確保台灣，同時提出“反攻大陸”。<sup>⑤</sup>先不論中共“解放台灣”的難度，單看蔣介石實施“反攻大陸”，就面臨諸多限制。

從主觀方面而言，國民黨撤至台灣的軍隊雖號稱60萬，但一半以上缺乏鬥志，自保尚且艱難，遑論大規模反攻。只是，解放軍在1949年10月金門戰役時遭受重創，顯示其尚無渡海作戰經驗，蔣介石及國民黨依靠台灣海峽的天然屏障，尚感一線生機，也使國共之戰暫時維持在大陸沿海。

從國際環境而言，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拙劣執政，早已讓盟友美國失望之至，判斷國民黨在台亦將不保，故採取棄台政策。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聲明，美國政府對於台灣的國民黨軍隊，將不予提供軍事援助。受美國對國民黨觀望政策之影響，菲律賓、越南等周邊小國對其亦加輕視。<sup>⑥</sup>翌日，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當局處於這種“外交”格局中，政權苟且生存尚屬困難，遑論“反攻大陸”之實施。

即便如此，蔣介石基於“勢不兩立”的立場，退台伊始便著手準備“反攻大陸”。一是在島內以“國家”安全為由，實行政治上的高壓政策，強化“黨國體制”，建構動員戡亂體制與戒嚴體制，以集中政黨意志。二是拼命動員在華盛頓的遊說團，讓美國感知國民黨存在於台灣，並有能力據守，試圖突破杜魯門聲明，引起美國介入而獲得實質援助。三是高度重視在大陸的潛伏工作，進行間諜滲透，開展破壞工作，以等待“反攻”時機。

2月1日，台灣當局“行政院”議決“內政部”作為大陸潛伏期間及小武裝活動的主管機關，“國防部”負責成形的武裝部隊的指揮補給。“準備收復大陸方案綱要”包括如何進入大陸，如何潛伏建立地下政權，如何發動小武裝，如何化整為零，如何構成面，如何擴大面等。此外還包括“普通的滲透工作”，鼓勵“有志之士”潛回大陸，從事地下工作與游擊工作，以滲透方式進入大陸後，與大陸民間反共領袖及反共武裝聯繫起來。<sup>⑦</sup>在這種破壞性戰略的指引下，駐金門國民黨軍派出“兩龍（龍溪、龍岩）游擊隊”滋擾大陸。福州在潛伏特務的指引下遭到國民黨的飛機轟炸，被焚毀民房1,700餘戶。龍溪地區僅在一年時間內就有638名幹部、戰士慘遭潛伏特務殺害。<sup>⑧</sup>

為振奮人心和鼓舞士氣，3月1日，蔣介石於台灣“復職”“總統”後，正式提出了“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蔣制定了具體計劃，提出軍事上“第一步鞏固台灣，光復大陸”。<sup>⑨</sup>為此，蔣加強在大陸佈置間諜與反間諜工作，並設立“對共匪研究會”，研究在大陸從事反間諜與策反工作。<sup>⑩</sup>

在蔣介石的要求下，台灣當局“國防部”慮及兩岸軍事力量的懸殊對比，正式提出首個反攻計劃，即積極發展“敵後”工作，在“友邦”海空軍協力下發動反攻，將主登陸地區預定為江浙閩粵沿海。在大陸儘量發展游擊戰，對大陸沿岸不時施行小規模登陸戰。就兵力佈置而言，台灣陸軍13個軍部，主力守備台灣，一個軍守備澎湖，兩個軍守備金門，一個師守備馬祖。“國防部”認為，蘇聯如不繼續積極幫助中共，則確保台灣仍決有把握；中共雖有蘇聯幫助，國民黨如能在1950年7月中旬以前，對裝備、防空雷達網、反潛力量等弱點獲得補救，確保台灣亦無問題。<sup>⑪</sup>由諸多國民黨黨政軍元老組成的戰略顧問委員會認為，國民黨如要反攻大陸，必須爭取有利時機，並需有兵力優勢，“至少需要增加20到30個步兵軍，始能獲得局部優勢，然兵員財力兩感困難”。<sup>⑫</sup>

細察國民黨上述反攻計劃，重點在“守”台灣。中共察覺1950年1月杜魯門聲明有放棄遠東之意，趁機加速實施“解放台灣”戰略。5月，中共解放了海南島、舟山群島和閩南的東山島等沿海

島嶼，對台、澎虎視眈眈。蔣介石決心集中全力守衛台澎，“以確保‘國家’微弱之命根”。<sup>13</sup>為解決兵力不足問題，蔣大張旗鼓宣稱“反攻”，通過軍事滲透，設法引發大陸大規模的反共游擊戰，鼓勵游擊戰士大量滲入大陸。<sup>14</sup>為解決反攻武器裝備不足問題，蔣希冀美國援助，提出惟有確保台灣，“反攻大陸”，始能牽制中國大陸，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蔓延。<sup>15</sup>但美國並未積極響應，國會未能為國民黨“反攻大陸”通過物質和道義上的援助方案。<sup>16</sup>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成為蔣介石確保台灣與實施“反攻大陸”之契機。台灣當局駐美“大使”顧維鈞將其等同於珍珠港事件，力促美國改變對台政策。美國也認為，朝鮮戰爭乃蘇聯可能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先聲，故重新審視遠東戰略，決定派出以其為首的聯合國軍隊，援韓作戰。美國還擔憂台海爆發戰爭，影響其全球戰略。6月27日，杜魯門發表“台灣中立化宣言”（即第二次杜魯門聲明），“我向第七艦隊下令阻止一切對台灣的攻擊。我亦向台灣的‘中國’政府呼籲，停止所有對中國本土的海空作戰行動。”<sup>17</sup>杜魯門之意乃把台灣處於“冷藏”（cold storage）狀態。<sup>18</sup>他在8月31日的講話中稱，韓戰結束後，第七艦隊沒有理由繼續停留在台灣海峽。<sup>19</sup>即使面對共和黨人要求美國“保護台灣”——如果必要的話動用武力，杜魯門表示，美國政府將不追求可能導致捲入中國內部衝突的行動。<sup>20</sup>換言之，杜魯門聲明有意避免背負“干涉內政”的惡名，其實質是表明“台灣地位未定”，未將台灣納入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但為此後的政策轉變留有餘地。

杜魯門聲明給國共兩黨帶來了很大影響。蔣介石見到該聲明，頗感沮喪，認為美國無視台灣“主權地位”，使其不能進攻大陸，“視我一如殖民地不若”。<sup>21</sup>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台“駐美大使”蔣廷黻堅持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將用於“反攻大陸”。<sup>22</sup>事實而論，杜魯門聲明拯救了正處於危機中的蔣介石，也限制蔣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美國反復強調國民黨不宜提“反攻大陸”，“暫不襲擊大陸”，如派遣襲擊，則宜限於少數精銳部隊，並要事先徵詢麥克阿瑟的意見。<sup>23</sup>蔣對此頗感不悅，又不得不順從美方之意，決定停止海空軍對大陸的攻擊行為。

美國政府對蔣雖持消極態度，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麥克阿瑟卻甚支持，給蔣注入了確保台灣與“反攻大陸”的強心劑。1950年8月1日，麥克阿瑟在未事先告知美國政府的前提下訪台，他告誡蔣，“任何一個敵對的攻擊都是非常愚蠢的，在我看來，幾乎是沒有機會成功的”。<sup>24</sup>不過，蔣卻能察覺麥克阿瑟或會有意變更杜魯門聲明，不限制對大陸的攻擊，<sup>25</sup>他宣佈，他和麥克阿瑟將軍將建立一個美台“軍事合作”與“共同防衛”的基礎。很快，美軍噴氣式飛機進駐新竹機場，麥克阿瑟總部派其聯絡組人員到台灣。<sup>26</sup>蔣介石獲得美國部分軍援後，重新展現出積極的軍事態勢，不但決定固守與廈門毗鄰的金門，而且準備進佔此前失去的浙東部分島嶼。

蔣介石準備實施“反攻大陸”尚有另一個利好消息，即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共暫時弱化了“解放台灣”的準備。杜魯門聲明出台時，中共強烈抗議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並未被其所縛。譬如，1950年7月1日，人民解放軍海陸軍協同一舉解放30多個沿海島嶼，擊斃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齊志鴻。4日，珠江口外島全部解放。20日，陳毅宣佈解放軍三野已被指派解放台灣，準備工作已經完成。<sup>27</sup>中共儘管尚未為進攻台灣設置具體日期，但所有報告顯示，一直在準備進攻國民黨控制的台灣。<sup>28</sup>台灣方面也稱，自杜魯門6月27日聲明後，中共增加了雙倍的潛在軍事力量。<sup>29</sup>然而，中共畢竟不能無視美國重返台海的客觀事實，面對朝鮮戰場的態勢，戰略重點逐漸轉移至保衛東北安全。蔣介石察覺中共受朝鮮戰局之影響，“其運輸船艦尚未向南大量移動”。<sup>30</sup>8月11日，中共中央致電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決定1951年不進攻台灣。<sup>31</sup>

由於中共“解放台灣”戰略受杜魯門聲明與朝鮮局勢的影響，國民黨對未來前途逐漸樂觀，“中

共本年攻擊台灣的威脅愈來愈小”，<sup>32</sup>可以等待“反攻大陸”的時機。1950年10月7日，陳誠在“立法院”報告，1951年兩大中心任務是建設台灣與“反攻大陸”，“現在大陸上游擊隊約達160萬人，應繼續加強，以作反攻時策應的力量”，“必須繼續選派忠貞幹部，潛入匪區，增建反共政權”。<sup>33</sup>10月25日，蔣介石在慶祝“台灣光復節”時發表廣播談話，呼籲同胞要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鞏固台灣基地，準備“反攻大陸”，重建“中華民國”為“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新中國”。<sup>34</sup>

## 二、爭取援韓作戰，制定具體反攻計劃

當朝鮮半島在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攻擊下大部淪陷時，中共領導人慮及東北安全與地緣政治之需，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於1950年10月25日入朝作戰。中共軍隊介入朝鮮戰爭，暫時延緩了“解放台灣”的步伐。儘管當時有大約9萬軍隊部署在海峽對面，在上海和廣東至少還有9支其他中共軍隊，但無證據顯示中共在做進攻準備。<sup>35</sup>蔣介石判斷中共捲入了朝鮮戰爭，台灣安全似已無虞，“反攻”便是當務之急，故寄望盡力爭取派兵援韓作戰，以此獲取美援，補充準備，提高“反攻大陸”的能力。

蔣介石亟需讓美國認識到國民黨援韓作戰的重要性與反攻的急迫性。當志願軍入朝作戰初期接連大捷時，蔣宣稱“聯合國軍如以海空軍助我‘國軍’反攻大陸，韓戰即可轉敗為勝”。<sup>36</sup>蔣說，如果美國限制國民黨軍隊反攻，“不啻保障敵人後方之安全，使得專意致力韓戰”。<sup>37</sup>不過，杜魯門總統認為美國花錢保護台灣，而有義務防守台灣的國民黨軍隊卻在韓國作戰，不符合邏輯。但國民黨當局基於聯合國憲章有關集體安全的規定，要求派兵赴韓參戰，表示它遵守國際義務。<sup>38</sup>

蔣介石希望加速“反攻大陸”尚有另一考慮，即中共為配合入朝作戰與穩定新生政權，明瞭國內敵特氾濫的嚴峻形勢，採取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毛澤東指示“對反革命分子必須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sup>39</sup>眾多潛伏於大陸的敵特分子被捕而遭處決。蔣擔憂如長久無反攻行動，在大陸的地下滲透工作或游擊隊將會不保，故判斷“不能不提前反攻也”。<sup>40</sup>

在朝鮮戰爭如火如荼之際，蔣介石認為應當充分利用國際局勢，“反攻大陸之準備為第一要務”，討論“分期反攻之計劃”。<sup>41</sup>何應欽談到，“在六個月內，國軍可能反攻大陸，但需充分軍火供給”。<sup>42</sup>為此，台“國防部”制定了“國軍反攻作戰指導方案”，由此前的游擊戰或滲透戰修改為正規反攻登陸戰，由主力守衛台灣改為用於反攻，預定反攻登陸時間為1953年6月，兵力5個軍15個師。其要點之一是國民黨軍隊參與韓戰，反攻登陸地點由江浙閩粵沿海改至鴨綠江南岸登陸，迅即轉用兵力於東北，與中共軍隊決戰。要點之二是應獲得聯合國海空軍之充分支持。在“國軍”登陸之前，聯合國海空軍必須全力轟炸東北諸要點，摧毀西朝鮮灣的中共潛艇，以確保制海空權，聯合國還應充分供應所需物資與補給。要點之三是為實施從東北反攻，“應於長江以南沿岸及附近之島嶼舟山海南等地實施突擊，同時策動大陸游擊隊之活動。”<sup>43</sup>

為實施此“反攻大陸”計劃，從1951年開始，蔣下令進行為期三年的補訓計劃。每年訓練補充兵8萬至10萬名，至1954年止共計約補充兵員24萬至30萬名之總數（補足50個步兵師），訓練民防隊36萬至50萬名（三年內總數）。希望三年內能補充與中共相等的空軍兵力，補足2~3個傘兵師，補足與中共裝甲部隊相等之兵力。此外，對海軍陸戰隊、海軍艦艇、重炮兵、工兵、運輸工具、通信工具、衛生部隊（防毒設施）、禦寒被服與裝備等等皆有命令。<sup>44</sup>為補充軍隊數量，蔣介石欲與美國協商解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越南禁閉之‘國軍’，運回台灣爭補”，“在韓反共之俘虜遣返台灣”，要求美國增撥20個步兵師之武器，在台聯合參謀機構之（速）組織，防衛台灣聯合作戰計劃

(從速)製成,反攻大陸方案之研究等等。<sup>⑤</sup>

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反攻大陸”聲勢高漲。這既是響應國民黨黨內的呼聲,要求杜魯門取消他 6 月 27 日禁止國民黨採取反擊中共的聲明,請求加速進攻大陸的計劃;<sup>⑥</sup>也與受美國軍方的重視與支持有關。麥克阿瑟認為,如予“國軍”適當支援,“反攻大陸”可獲成功,可以加速韓戰勝利。他表示,可以在西太平洋海軍的能力範圍之內,給予“國軍”關於“反攻大陸”戰略計劃上所需要的援助。<sup>⑦</sup>麥克阿瑟相信,如果使用部分國民黨軍隊,可以“減輕我們在韓部隊所受的壓力,並減少我們萬千生命的犧牲”。<sup>⑧</sup>蔣介石受台灣島內外之鼓舞,認為反攻時機正在成熟,遂成立反攻機構,完善反攻計劃,指示“空軍司令”周至柔,“反攻大陸”準備與執行機構擬定名為“反攻籌備處”或“反攻執行部”,並指定負責人員切實進行。<sup>⑨</sup>

儘管通過援韓作戰並在東北登陸的反攻計劃不能儘快實施,但蔣介石要求加速對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的武裝滲透,進行小股部隊的襲擾,作為登陸反攻的牽制,在金門島、大陳島、台灣建立游擊指揮部或司令部。蔣提倡到達從軍年齡的青年去大陸從事地下工作,使他們滲透到大陸內部和幫助反共游擊隊。<sup>⑩</sup>蔣還思考香港地下工作的佈置,重點是男女傭工與混入內地,並囑其子蔣經國親自負責。<sup>⑪</sup>

當中共屯兵東北且專注於朝鮮戰爭時,確為蔣介石“反攻大陸”之時機。但中共高層對蔣爭取援韓反攻的意圖,保持著高度警惕。毛澤東判斷國民黨軍隊不可能從東北反攻,因“美國並沒有準備在目前發動世界戰爭。”<sup>⑫</sup>毛澤東亦估計美國軍方支持蔣入韓作戰與“反攻大陸”的冒險行徑,麥克阿瑟“可能在 1 月底宣佈終止台匪出擊大陸的限制”,要求華東軍區加強防禦準備。<sup>⑬</sup>毛澤東樂觀地認為,國民黨軍隊雖有 60 萬人,能用於侵擾粵、閩、浙者至多 20 萬人,亦不足為患。除守衛虎門、廈門、舟山、吳淞四處及珠江口外某些海島外,其餘一切海岸線,“都不要守而要讓他進來,以利聚殲。”<sup>⑭</sup>

即使在人民解放軍的嚴防之下,蔣介石仍不惜冒險一試,以造成反攻的緊張氛圍。譬如,福建境內的匪特活動相當猖獗,台灣不斷派特務到大陸來,並空投武器、彈藥、通訊器材,支持內地的潛匪,企圖對沿海解放軍造成內外夾擊之勢。<sup>⑮</sup>兩岸局勢驟然緊張,台灣和蔣介石再次處於國際政治的風暴中心。蔣亦忙於制定或聽取各種反攻計劃,如“三七五”計劃、“二三四”各種計劃。<sup>⑯</sup>目前筆者尚未查到該計劃的具體內容,但據蔣的日記推斷,應與對大陸採取跳傘登陸以配合游擊戰計劃有關,“反攻以前,必須對大陸用跳傘戰分佈要轄,如有 5 萬至 10 萬人著陸則幾矣。”<sup>⑰</sup>蔣樂觀估計:“我相信有今年一年的基礎,再加上明年一年的準備,我們一定可以光復大陸。”<sup>⑱</sup>

### 三、響應“解除台灣中立化”,嘗試沿海軍事反攻

隨著朝鮮戰爭膠著狀態的持續,杜魯門並不願過分擴大戰局,以免蘇聯介入,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1951 年 11 月,杜魯門宣佈免除麥克阿瑟的一切職務,任命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繼任韓境內聯合國軍最高統帥,蔣介石失去了一位“反攻大陸”的積極支持者。但 1952 年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後,推行“解除台灣中立化”政策,刺激蔣進一步實施“反攻大陸”計劃,嘗試沿海軍事反攻。

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時,雖未允許蔣介石實施大規模反攻行動,但支持對大陸沿海的小規模襲擊,使中共難以兼顧兩頭,以適當減輕美軍在朝鮮戰場的壓力。據顧維鈞向蔣透露,“我如由沿海小島繼續作小規模之襲擊,而遭中共方追擊或反攻我所控各小島,美方可能予我協助抵阻。”<sup>⑲</sup>艾森

豪威爾對蔣的支持，從克拉克上將訪問蔣的談話中亦有體現。克拉克告知蔣，說艾森豪威爾認為“惟反攻事大，必須有計劃，有準備，始能精確執行”，如果“韓戰停戰談判失敗”，就會擴大戰爭，包括轟炸東北在內，“但最有效之反擊，尚係在大陸沿海登陸。”蔣表示，“一旦反攻開始，陸軍方面之人力，我方當然可以獨力擔任，美援可僅限於裝備彈藥，但對於我海空軍，應有繼續及無限制之援助”。<sup>④</sup>當然，克拉克之言是否可信，仍尚需懷疑。美國外交官表示，他們將連續反對在韓國運用國民黨軍隊，美國國防部也同意這一觀點。<sup>⑤</sup>

艾森豪威爾的確給蔣“反攻大陸”提供了信心。蔣預定 1953 年春實施正式反攻，“開闢第二戰場，使中共面臨三面作戰”。<sup>⑥</sup>1952 年 10 月，國民黨在台北召開“七全大會”，正式將“反攻大陸”確定為台灣當局的基本“國策”。在蔣介石 66 歲生日前夕，國民黨發表宣言，呼籲超過一千萬的海外中國人，形成組織，支持國民黨的“反共抗俄”立場。<sup>⑦</sup>

在“反攻”“國策”的指引下，10 月，國民黨軍 6,000 人侵犯福建沿海南日島，人民解放軍守島部隊英勇抵抗，但寡不敵眾，後續部隊增援兩個營，因指揮不當，遭受嚴重傷亡，全島一度被國民黨軍佔領。<sup>⑧</sup>經過“反攻”嘗到甜頭的蔣介石，再次集中考慮反攻計劃，包括兵力的使用、美援的運用以及“中”美安全互助，等等。<sup>⑨</sup>就游擊戰“反攻”而言，1952 年度可謂“戰果輝煌”，從 1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的 2,165 次軍事行動中，中共部隊傷亡 41,727 人，被俘 3,025 人，在此期間，游擊隊攻擊和短暫佔領大陸 21 個城鎮、350 個村莊和 9 個沿海島嶼。<sup>⑩</sup>截止 1952 年底，至少在大陸東南地區牽制 20 萬名中共部隊。<sup>⑪</sup>上述數據或為起到宣傳效果而誇大，但台灣當局的游擊滲透作戰及小規模“反攻”讓中共不敢掉以輕心。

針對國民黨軍隊的“反攻”圖謀，毛澤東作了相應部署，指示華東局、華東軍區、福建省委、福建軍區，並告中南軍區，要求加強防備，粉碎國民黨軍對福建沿海的進攻。<sup>⑫</sup>對於國民黨向大陸空投武裝特務的情況，毛澤東指示公安部長羅瑞卿，“可能空降特務的山區，設立武裝便衣偵察據點，專門對付敵人空降特務，沒有事生產和學習，有事報信捉特務”。<sup>⑬</sup>

1953 年 1 月 20 日，艾森豪威爾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出台“解除台灣中立化”政策，縱容國民黨軍隊對大陸的主動攻擊行為。蔣介石認為這一講話為“自二戰結束以來第一束人類的希望光芒”。<sup>⑭</sup>2 月 2 日，艾森豪威爾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將命令第七艦隊對於中國大陸中止其遮掩之責，雖然他表示“此項命令並不隱含美國對任何方面具有侵略企圖”，<sup>⑮</sup>蔣解讀為“對大陸沿海則任由國軍行動不再掩護其共匪之意”，<sup>⑯</sup>稱讚這個決定是明智的、道德的，國民黨將不會尋求任何外國地面部隊援助以光復大陸，他親擬響應“解除台灣中立化”宣言，表示“決不要求美國陸軍在大陸助戰一段非鄭重聲明不可”。<sup>⑰</sup>蔣的言下之意是，“反攻大陸”是“中國內政”，並不要求美國軍隊直接參與，讓美國放心不會被捲入國共內戰之中。

艾森豪威爾政策給蔣介石很大鼓舞，蔣命“國防部”再次修正反攻作戰方案，即“國軍主力主動反擊大陸案”、“以一部分參與韓戰，主力相機反攻大陸案”、“主力參與韓戰爾後專用兵力於東北以行反攻案”。“國防部”認為第三個方案成功率最大，但先決條件是“參與韓戰”，還必須獲得聯合國的諒解與支持，需要聯合國空軍全力轟炸東北戰略要點及交通樞紐，確保戰場之制海制空權。<sup>⑱</sup>

就事實而論，蔣介石的上述計劃均難以實施。美國表示，只能給台灣提供一定的軍援與經援，但不能提供任何陸軍在大陸助戰，蔣只能依靠台灣當局自身力量“反攻”，困難重重。一是人民解放軍加強沿海防衛，有效遏制了國民黨軍的侵擾式反攻，這種侵擾式反攻並無助於大局之改變。二是美國不允許國民黨軍隊參與韓戰，基本喪失從東北反攻的可能性，杜絕了美軍直接介入“反攻”

的可能性。三是國民黨軍與中共軍隊相較而言，自身實力難以達到規模性的反攻水準。

故而，蔣介石只得等待國際局勢變化與大陸“內亂”。如蔣所言，“應配合世界大勢，當待第三次大戰發動時反攻大陸”，“只要我能自力更生，實力自強時，不患共匪內訌之不至，亦不患世界大戰之不來，即使延遲十年之久，亦不致過晚，應忍辱耐苦，沉機應變。”<sup>⑤</sup>

艾森豪威爾在冷戰背景下，並未改變以歐洲作為整個戰略的重心，謀求在朝鮮停戰，不願支持蔣實施“反攻大陸”。1953年5月24日，台“國防部”再次調整反攻計劃，反攻時期預定為1957年夏（如能增加訓練後備兵員人數，亦可提前於1956年夏季開始反攻），反攻地點由從東北進入轉向華東南地區。“第一期，攻略華南要城（六個月至一年）。第二期，勘定揚子江以南地域，同時攻略上海海口（六個月至一年）。第三期，勘定全國（二年至三年）。”<sup>⑥</sup>蔣介石很快認識到，“今後反共復國不能再寄望於美援或第三次大戰，而全在於自立與注力於俄共內變。”<sup>⑦</sup>

隨著《朝鮮停戰協定》的到來，國民黨發動了最大的一次軍事反攻，以造聲勢。1953年7月16日，駐守金門的國民黨軍1.3萬人由胡璉帶領，在海、空軍協動下，對距離金門80海里的福建東山島發動進攻。蔣把剛從美國顧問訓練的空降部隊首次用上了，高調宣稱這是“反攻大陸”的前奏，但很快遭到了失敗，大規模軍事“反攻大陸”破產，被迫回歸潛伏與游擊滲透的“反攻”模式。

與此同時，中共加強軍事防禦準備，持續打擊國民黨特務在大陸的潛伏與滲透，有效瓦解國民黨的反攻計劃。據1953年8月6日台灣當局“保密局”報告，“半年來大陸的情報工作比以前困難，且華北重要地點如平津、石家莊等電台皆已被匪破獲矣，犧牲幹部亦不少也。”<sup>⑧</sup>中共也加緊了海軍建設，重視海防。毛澤東指出，為了在適當時機收復台灣，“有計劃地逐步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sup>⑨</sup>

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為圍堵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當局於1954年12月簽訂《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在武力上協防台灣，明確協防範圍並未包括金門、馬祖等外島，以造成國共兩黨戰爭狀態的“隔離”。此條約使美國捲入中國內戰的可能性最小化，中共很難繼續實施“解放台灣”戰略，蔣介石亦不能任意“反攻大陸”。

## 結 論

由上所述可知，1950年代初期蔣介石“反攻大陸”與國際局勢、美國政策、中共的應對等密切相關，也是冷戰背景下各種力量縱橫捭闔的場景。朝鮮戰爭發生，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但美國力避捲入與中共直接衝突，並不支持蔣實施大規模軍事反攻。當中共採取“解放台灣”的戰略時，蔣介石極力突破杜魯門聲明，制定反攻計劃，向大陸實施滲透，採取小規模游擊戰，獲取美國軍援，進而保衛台、澎。當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後，蔣介石修改“反攻計劃”，寄望派兵援韓與從東北“反攻”，試圖將正規軍事反攻與滲透戰相結合。艾森豪威爾任美國總統時，推行“解除台灣中立化”政策，蔣再次修正“反攻”作戰方案，進行了一些侵擾式反攻。朝鮮停戰後不久，美台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暫時偃旗息鼓。

蔣介石在敗退台灣初期尚難自保、“外交”環境極為不利的情況下，借助朝鮮戰爭的機會，通過“反攻大陸”的計劃與實施，爭取美國援助，獲得了台灣的安全保障，還向外宣示“中華民國”在台灣存在的“合法性”，可謂一箭雙雕，體現了蔣善於利用國際大勢為己所用的一貫特點。只是，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計劃重於實施，宣傳重於實效，“反攻大陸”成為蔣退台後實施“緊急狀態戡亂條例”的依據，也為在台灣實施威權政治提供了充分的藉口。

①如中國大陸沈志華、熊志勇、牛軍、趙學功、章百家、齊德學等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台灣學者劉維開的《蔣中正對韓戰的認知與應因》(台灣台北縣:《輔仁歷史學報》,第21期,2008年7月)全面探討了蔣介石希望派兵加入韓戰的思考。美國的代表性成果如:O. Edmund Clubb, *Formosa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in American Policy, 1950-1955*,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74, No. 4 (Dec., 1959); Leonard H. D. Gordon, *United States Opposition to Use of Force in the Taiwan Strait, 1954-1962*,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2, No. 3 (Dec., 1985)。

②大陸的代表性成果有:牛勇:《栓緊韁繩與反攻大陸:肯尼迪與蔣介石的戰略之爭》,北京:《北京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蔣介石反攻大陸》,福建廈門:《台灣研究集刊》,1997年第2期;劉子奎:《肯尼迪政府與蔣介石“反攻大陸”》,北京:《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1期;李健:《反攻大陸密謀透析》,北京:華文出版社,1996年;霍輝:《國民黨反攻大陸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美國的代表性成果有:Jean S. Kang,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U. S. Response to Chinese Nationalist Mainland Recovery Efforts, 1961-1963*,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 15, Special Volume- Cold War Across the Pacific (2008)。

③楊晨光:《台海熱戰:1949-1965——未完成的國共內戰》,台北:中興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陳鴻獻:《反攻三部曲:1950年代初期國軍軍事反攻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另外,張淑雅亦有相關研究成果,大多探討美國的對台政策,如《美國對台政策轉變的考察,1950年12月-1951年1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1950年代美國對台決策模式分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年6月)等。

④Robert W. Sellen II, *Chiang Kai-Shek: A Study in Political Personality*, *Politico*, Vol. 39, No. 3 (Sept. 1974)。

⑤1949年6月26日,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在東南區軍事會議總理紀念周發表《本黨革命的經過與失敗的因果關係》講話,提出了“反攻”口號。陳誠於

9月12日表示利用金門等重要島嶼,“作爾後反攻大陸的橋樑”,他離開廈門時稱,以台灣作為“反攻大陸”及復興的基地。“固守金門作爾後反攻大陸的橋樑——於金門對各部隊團長以上幹部講”,陳誠“副總統”文物,言論第21集(1949年1月~12月),台北:“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102-00021-040。

⑥《蔣介石日記》,1950年3月18日上星期反省錄,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藏(下同)。

⑦《行政院呈“領導機構應如何確定”及“反攻大陸革命建設大綱草案”》,蔣中正“總統”文物,各方建議(二)19491222-19500206,台北:“國史館”藏(下同),典藏號002-080101-00025-007。

⑧戴爾濟主編,福建省新四軍研究會編:《葉飛紀念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86、183頁。

⑨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New York Times, Mar. 3, 1950; Sept. 3, 1950; Aug. 27, 1950; Jun. 28, 1950; Aug. 1, 1950; Jul. 20, 1950; Jul. 30, 1950; Aug. 2, 1950; Nov. 13, 1950; Dec. 25, 1950; Jan. 6, 1951; Sept. 9, 1952; Oct. 31, 1952; Dec. 30, 1952; Dec. 7, 1952; Jan. 25, 1953。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蔣介石日記》,1950年3月7日、15日;1950年4月30日;1950年6月28日;1950年8月1日;1950年8月4日;1950年2月23日;1950年1月1日、5日;1950年3月20日、21日;1951年7月25日;1951年10月24日;1952年12月9日、10日、11日、16日;1953年1月31日;1953年2月3日;1953年5月3日;1953年7月7日;1953年8月6日。

①①《反攻大陸計劃要點及我軍戰況》,蔣中正“總統”文物,作戰計劃及設防(二),典藏號002-080102-00008-003。

①②《戰略顧問委員會呈反攻大陸之建議》,蔣中正“總統”文物,中央軍事報告及建議(六),典藏號002-080102-00049-001。

①③《關於現反攻軍事準備與反攻登陸作戰等口頭報告擇要及對反攻大陸之意見》,蔣中正“總統”文物,中央軍事報告及建議(六),典藏號002-080102-00049-004。

①④①⑤①⑥①⑦①⑧①⑨①⑩台北:《中央日報》,1950年5月9

日;1950年8月12日;1950年10月7日;1950年12月9日;1951年1月19日;1951年5月6日;1951年6月19日;1951年12月29日。

⑩《毛邦初李維果電蔣中正等中美關係情報》，蔣中正“總統”文物，對美關係(六)，典藏號002-090103-00007-026。

⑪戴天昭：《台灣國際政治史》，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第370頁。

⑫O. Edmund Clubb, *Formosa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in American Policy, 1950-1955*.

⑬《毛邦初俞國華電》(1950年6月30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防情報及宣傳(四)，典藏號002-080106-00011-008。

⑭《蔣介石日記》，1950年7月15日，上星期反省錄。

⑮李顯榮：《炮擊金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頁。

⑯李勇、張仲田：《蔣介石年譜》，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第403~404頁。

⑰《魏道明函蔣中正美國輿情之分析及對台海軍事形勢之建議》，蔣中正“總統”文物，對美國外交(八)，典藏號002-080106-00030-008。

⑱林正義(Cheng-Yi Lin)：《韓戰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台北：《美國研究》，第19卷第4期(1989年12月)。

⑲⑳㉑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51年1月-12月)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6頁；第26頁；第25頁。

㉒《國防部呈蔣中正國軍反攻作戰指導方案》，蔣中正“總統”文物，作戰計劃及設防(二)，典藏號002-080102-00008-008。

㉓《抄錄總統手令國軍三年補訓計劃反攻大陸目的及與美國協商問題解決韓戰意見等》，蔣中正“總統”文物，國防設施計劃(四)，典藏號002-080102-00006-003。

㉔《抄錄總統手令：與美國急欲協商解決之問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防設施計劃(四)，典藏號002-080102-00006-003。

㉕《蔣中正指示周至柔呈擬反攻大陸準備與執行機

構名稱及組織內容》，蔣中正“總統”文物，籌筆—戡亂時期(十六)，典藏號002-010400-000160034。

㉖㉗㉘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5~136頁；第251頁注釋1；第250~251頁；第314頁。

㉚《葉飛傳1914-1999》(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440頁。

㉛《顧維鈞電蔣中正海軍總司令馬紀壯訪美洽談助國軍反攻大陸軍事協助及美國會對中國所持態度》，蔣中正“總統”文物，對美國外交(十一)，典藏號002-080106-00033-016。

㉜《蔣中正接見美國華美協進社理事長克拉克上將針對美援台灣與反攻大陸作戰準備計劃等會談記錄》，蔣中正“總統”文物，對美國外交(十一)，典藏號002-080106-00033-007。

㉝《抄錄總統手令：反攻大陸之目的》(1952)，蔣中正“總統”文物，國防設施計劃(四)，典藏號002-080102-00006-003。

㉞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620頁。

㉟《美艾森豪威爾總統對國會發表國情咨文命第七艦隊對中國大陸中止其遮掩之責並繼續防止中共攻擊台灣及澎湖等行動中英譯文》，蔣中正“總統”文物，對美國外交(十一)，典藏號002-080106-00033-020。

㊱《國軍反攻作戰指導方案立案之研究》(1953年1月)，蔣中正“總統”文物，作戰計劃及設防(二)，典藏號002-080102-00008-008。

㊲《中國國軍反攻大陸作戰準備計劃概要——兵員與裝備部分》(1953年5月24日)，蔣中正“總統”文物，作戰計劃及設防(二)，典藏號002-080102-00008-008。

作者簡介：劉大禹，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江蘇無錫 214122

[責任編輯 陳志雄]